

兩岸服貿協議民眾的媒體信任、 政治信任、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分析*

傅文成**

摘要

本研究檢驗民眾對政府企圖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媒體信任程度如何影響其風險感知、風險接受程度與行為意圖。並驗證傳播媒體在民眾面對服貿協議此重大的社會風險議題時，如何影響社會大眾。本研究於立法院審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時進行全國性電話民意調查，獲得 1,269 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媒體的信任與關注程度，顯著影響部分的風險感知、風險接受程度與行為意圖。而媒體新聞關注程度與政治信任感亦有相似效果。

關鍵字：行為意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政治信任、風險感知、媒體信任

* 本研究為科技部計畫《重大公共政策之媒體議題設定研究：檢視媒介使用、風險感知因素與行為效果》104-2410-H-606-005-SS3 之部分研究成果。

** 傅文成為國防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uiucfuwenche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6/12/23；通過日期：2017/07/16

壹、研究動機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又簡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或《服貿》，是海基會與海協會於 2010 年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所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此議題在台灣為爭議性極高之重大政策議題，根據協議內容，台灣將對中國開放跨境服務等四大服務類別之商品服務。其中，為台灣產業界所憂心的條件，包含中國企業將可把服務提供至台灣境內，並在台灣設立商業據點。例如，在美容美髮業方面，大陸廠商可在台灣以獨資與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以及中國將可派遣員工至台灣實施服務與商業行為等措施。^[1]

然而，中國對台灣的承諾項目，並非與台灣所承諾服務項目對等，^[2] 例如，台灣對中國企業來台跨境服務並沒有限制，然而在同項目下，中國卻不承諾開放。此非雙向對等開放協議在台灣社會掀起劇烈反彈，林向愷（2013.08.24）認為，此協議對台灣的傷害甚大，因兩岸市場規模差距極大、政治體制有別，協議嚴重衝擊台灣中小企業，特別是資本額較小的美髮業、餐飲、旅遊等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但政府從協議溝通、談判到簽署，始終未適當公開訊息，納入台灣民間及產業界的討論意見，而採「先簽後公布」的形式；此外，合法來台居留的中國大陸管理人員無需負擔公民義務即可享有各項公共服務。中國為移居台灣所進行的投資，在提昇服務業技術方面，貢獻有限。然而，卻可能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及政治、主權方面的傷害。對台灣民眾而言，服貿協議是個內容複雜、與台灣未來經濟乃至國家安全高度相關的重要議題。

在上述的議題發展脈絡下，協議付委後即激起極大爭議，甚至引發大規模的學生社會運動。學生與社運團體佔領立法院，癱瘓立院運作，使國會殿堂陷入空轉。其主要爭議點，在執政黨控制的國會多數，拒將服貿協議交由國會實質審查，由於試圖規避國會監督，但卻又希望國會為其政策背書，要求國會一字不改地照案通過，引發社會極大不安與騷動（Lin & Culpan, 2014.03.19）。

林鈺雄（2014.03.22）則在學生於 2014 年 3 月 18 日佔領立法院後指出，^[3] 因為媒體的大幅報導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議題在台灣社會為重要且複雜風險議題。對台灣民眾而言，

此議題具有幾項重要風險特性，包含台灣整體經濟將過度依賴中國失去自主性、健保體系的透支與超支、衝擊整體薪資結構及國家整體安全受威脅等重大風險；故在此議題在立法院付委時，促使學生與社運團體展開社會運動，於 2014 年 3 月 18 日占領立法院，逼迫執政當局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由此過程可以得知，本議題透過專家頻繁發聲及媒體的密集報導，發展為公眾強烈關心、社會組織高度重視議題，所形成的民意足以影響政府決策過程。

Slovic (1987) 認為，媒體的報導雖然是民眾了解社會風險議題並擴大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然而，社會大眾也可能透過媒體報導而將風險事件的衝擊產生過度解讀的情形。Renn (1991) 的研究也提出，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信任感程度高低、使用頻率多寡，正向顯著預測對風險事件的感知。此外，Mou & Lin (2014) 的研究提供了此現象的解釋，認為民眾對風險的感知，常來自媒體的報導，因為一般群眾對實際風險所造成傷害的接觸程度較低，也不會直接體會到風險本身所造成的衝擊，故媒體是群眾接觸外在世界的重要來源。故本研究認為，民眾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後的風險認知與媒體新聞關注程度有極密切關聯性。

再者，對比國內 TVBS 民意調查中心針對政府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期間，學生運動發起前 (2013 年 6 月 25 日)^[4] 及學生運動進行中 (2014 年 3 月 30 日)^[5] 所進行民調結果，發現在 2013 年 6 月時，受訪民眾對政府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支持與反對分比約略為 30% 與 47%。同時，亦有 84% 受訪者表示不了解服貿協議的內容。然而，在經歷了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與媒體大篇幅報導後，反對簽訂服貿協議的群眾高達 58%，並且 88% 的民眾認為，整體協議應該要經過逐條審查，而非執政當局所推動的包裹式審查，此時支持簽訂服貿協議的民眾只剩下 18%，為數眾多的民眾態度轉趨觀望。值得一提的是，還有 69% 的群眾表示不了解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內容。

進一步將兩次民意調查的結果相互比較後，發現在此重大議題發酵前後，服貿協議支持度落差達到 12%，然而，對協議內容的了解程度還是僅有三成左右，顯示在議題發展的九個月期間，歷經了重大社會運動及大量的媒體報導後，還有超過七成的民眾不了解內容，但表態支持或是不支持的民眾合計達到七成六。換言之，大多數的民眾對

複雜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判斷機制，並非是依賴全盤了解與深究協議本身對整體經濟與社會衝擊後，再仔細思考評量後決定。

從前述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民眾對簽訂兩岸服務協議支持與否與利弊得失的訊息，主要來自媒體的報導，但媒體的報導方式所呈現的媒介真實，與實際上服務貿易協議所造成的風險及衝擊程度所代表的社會真實，在程度上有所落差，故民眾所感知的風險程度與實際社會真實也存在差異。Breakwell（2000）的研究也證實，閱聽人感受到的媒體真實，與社會真實之間確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台灣此一政黨對立嚴重的社會氛圍中，以社會調查法檢驗，在服貿協議此一重要社會風險議題下，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與媒體新聞關注程度，是否影響民眾對具有風險公共政策的感知、接受程度及是否產生拒絕購買大陸商品服務及多加購買台灣本地的商品等行為意圖。由此，可進一步了解當大眾對風險問題產生不確定性，將如何在紛雜的資訊中處理重大公共政策所產生的風險議題？尤其現代的閱聽人尋求資訊的管道相當多元，除了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與廣播外，網路新聞與及社群媒體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

貳、文獻探討

一、媒體與風險社會

Beck（1986/1992）認為，近代形成的工業社會促使都市人口快速集中後，所衍生的各項風險遠較工業社會形成前複雜。其主要原因應為，新的經濟型態深化原有的社會階級不平等，並造成階級流動緩慢。同時間，也產生了更多更複雜的社會風險、自然環境風險、經濟風險等問題。一般民眾平日的日常生活幾乎都在風險中選擇與度過。上述的風險種類，已然全面性的影響到民眾的生活、社會運作與政治經濟結構。Beck 的論述中，所指涉的「風險」是指有一定的機會發生，及發生後對民眾會造成某種程度衝擊的事件。他進一步論述風險社會的發展時認為，因為工業社會現代化後，隨著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頻繁，導致風險發生時常牽絆著全球不同國家一起遭受風險事件的威脅。舉例而言，當希臘債務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違約事件在歐洲發生時，台灣的銀行與投資人也因為當初全球投資策略的關

係，有約 32 億元台幣的損失，連帶著影響台灣金融秩序的穩定（林倖妃、林昭儀，2013.02.05）。

過往在探討風險議題傳播時，多數研究認為，傳播媒體在散佈風險相關的資訊及群眾的感知層面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Griffin & Dunwoody, 2000；Procopio & Procopio, 2007；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然而，媒體所呈現的媒介真實往往與社會真實有所落差（Boyce, 2007）。媒體記者在思考選擇報導與否的時候，有可能會避開他們不了解的議題，並且以該新聞事件是否具備一定新聞價值為篩選依據，故媒體對此風險性的報導常會偏離現實（Levi, 2001）。而媒體對風險議題的選擇及其報導的強調程度，卻與閱聽人所呈現風險感知與風險接受程度有高度相關，故在上述的議題論述脈絡下，新聞記者報導風險議題與否，是取決自己的判斷，這也解釋了為何記者在報導時常會忽略其真正的風險影響，也常在新聞報導中忽略了解釋風險的形成原因（Asim & Todd, 2010）。故媒體對此風險性的報導常會偏離現實（Lews & Tyshenko, 2009）。以上的論述脈絡下，民眾多參考這些與真實風險特性背離的報導，判斷自己本身的立場，及是否應該採取因應風險的行為意圖，本身即具備一定的風險（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

在新媒體與風險議題的研究方面，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已改變了閱聽人在媒體使用上的習慣及型態（Bekkers, Beunders, Edwards, & Moody, 2011）。在當代民主社會及公民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網際網路提供有別傳統媒體的公共領域實踐的可能性（Dart, 2014）。由於網路所提供的匿名特質，使得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擁有多重特質的身分的可能性，在網路上面的發言機會相較傳統媒體閱聽人的近用性較強，也較無限制，網際網路也因此被認為是公民抒發意見，及對公共政策提出建議的管道（Naumov, 2014）。楊意菁（2013）的研究也證實網友們在網路上發表的意見，對於影響社會大眾在議題的立場選擇上，有著難以忽視的影響力。在臺灣，因為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所引起的 318 學運中，有為數眾多的學生運動參與者透過網路的「懶人包」了解協議的內容，亦透過社群網站，諸如臉書為主要管道，用以瀏覽相關議題的消息，並據以為是否參加抗議活動的重要參考依據（Jennings, 2014.04.10）。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在臺灣的媒體所呈現的風險可分成幾

下列面向：對台灣本土小型產業的傷害、對整體經濟與對岸依賴程度增加、及使中國人員進入台灣本地工作，並導致對本國勞工產生排擠效應等（郝明義，2013.06.21；殷乃平，2013.07.03；林向愷，2013.08.24；林鈺雄，2014.03.22）。由此，服貿協議屬國家重大經貿政策，且其牽涉範圍甚廣，在本質上乃為互有利弊的經貿議題，經過媒體的放大後，風險層面的影響在人民認知上很可能大於其利益層面。

承上所述，從風險議題傳播的實證研究成果來看，媒體在幫助民眾了解重大社會相關議題的風險層面的功能的角色得到肯定，然而，媒體本身對該議題的知識及立場則是需要仔細檢視。例如，Asim & Todd（2010）針對媒體報導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的風險議題時發現，相關媒體對地球暖化的程度及速度都有誇飾的嫌疑。以至創造出地球整體氣候系統正在快速崩壞的議題框架，而報導中內容偏向將議題的風險性深化，但沒有太多的改進建議，此議題報導角度讓民眾對地球暖化的風險恐慌感增加，卻沒有提出解決的方式。

二、媒體信任與議題感知

信任感可定義為是種對他人或是他事的正面認知偏差（Cook & Cooper, 2001），及對他人行為上正面的期待（Cairns, de Andrade, & MacDonald, 2013）。而信任的期待發生的前提是，民眾面臨不確定的情境，且自身的利益處可能受到傷害的劣勢下，對他人所產生的正向行為期待（Bakir, 2006）。而 Neff, Chan, & Smith（2009）的研究進一步認為，信任感也是一般閱聽人選擇資訊行為前，賴以判斷的重要參考依據。尤其民眾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及複雜的風險性問題時，民眾賴以判斷使用何種媒體管道以獲取訊息，在此決策過程中，閱聽人時常以「信任感」作為主核心的綜合判斷依據。換言之，信任感是風險認知主要的價值判斷因素，此信任感可能包含政治的信任感與媒體的信任感。

而媒體信任感則是指涉社會大眾對於新聞媒體報導的信賴程度（Ladd, 2010）。政治傳播與投票行為相關研究中常認為媒體信任感是影響選民是否採信媒體報導之候選人政見的重要因素（Ladd, 2011；Williams, 2012；Forbes & Vespoli, 2013）。換言之，媒體是社會大眾對於公共政策議題感知的重要途徑，而媒體信任感則是影響其對於感

知途徑選擇的考量要點。Mutz (2005) 的研究則是進一步指出，閱聽人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感知其無法直接觸及之社會議題，並進而產生支持與否的態度。通常，對於信任程度越高的媒體，閱聽人進一步交叉查證的機會越小，也樂於跟同儕談論相關的報導。國內的研究方面，楊意菁、徐美苓 (2012) 則是認為，在風險議題傳播的過程中，媒體是扮演一種「準專家機制」的功能，透過大眾傳播的信賴感，傳播各種風險議題的主、客觀知識。在形成政策輿論的過程中，是值得探討的變項。本研究即是在此脈絡下，檢視媒體信任感對於服貿議題風險感知的立場與接受程度。

再者，Slovic (1987) 認為，媒體的傳播，會讓民眾覺知正面臨的風險事件時，影響判斷事件的嚴重程度升高，並且媒體是民眾感知特定事件風險程度的主要來源。Kasperson et al. (1988) 則進一步認為，民眾對媒體信任感的高低，影響其認知該議題所帶來的風險，並偏向信任感高的媒體立場。以 Mazur (1984) 對三哩島核洩漏事故的分析為例，透過計算媒體頭條與重複報導的總量，以及報導中正反二方專家學者爭辯的過程，並經由媒體信任感的中介後，進一步影響閱聽眾對該事件影響的憂心程度。再者，Vijaykumar, Jin, & Nowak (2015) 檢驗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H1N1) 病毒傳染議題也發現，大眾的媒體使用行為與媒體信任程度對其評估本身受感染的憂慮程度成正向關聯；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楊意菁、徐美苓 (2012) 針對全球暖化的公眾風險感知的調查中則發現，社會大眾對議題的風險感知上，與媒體的使用及注意程度呈現正向相關。

蘇蘅、傅榆 (2011.11) 以問卷調查抽樣訪問全台灣 1,318 位大學生，以了解大學生如何從不同特質的媒體獲得美國牛爭議的風險訊息，並分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美國牛肉事件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除發現網路新聞注意程度和大學生的風險資訊尋求與知識評估相關；值得一提的是，新世代的大學生對爭議性議題的資訊來源不侷限於傳統媒體，而偏向較信賴的媒體，故本研究將社會大眾的媒體信任感設定為研究主軸之一。

另一闡述媒體信任感與議題感知關係密切的研究則是，O'Brien (2009.01) 發現，媒體長期對政策議題負面報導，會促使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感降低。而探究其信任感降低的原因發現，民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民眾個人的人口變項，諸如年齡、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等

因素，是其對於議題的風險感知程度高低的主要影響因素。台灣目前媒體發展現況則是，媒體頻道開放後，媒體競爭激烈，媒體內容日趨低落，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日趨低落（彭芸，2004）

傳統媒體雖然受到網路媒體的挑戰，但是洪雅慧（2009）調查北、高兩市選民評估媒介的重要性，發現電視政治新聞皆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媒介，報紙政治新聞次之，而在新媒介中的「入口網站的政治新聞」則排在第三順位，此外，人際互動管道與網路上的政治資訊互動亦有密切關聯。另外，由「群我倫理促進會」委託《遠見雜誌》民調中心執行「台灣信任調查」顯示，台灣人最信任的對象是家人朋友，最不信任的是媒體名嘴（〈台民眾信任度調查：命理師和名嘴墊底〉，2011.06.01）。在「2015年台灣社會信任度」調查中，進一步詢問過去的一年中，民眾認為衝擊台灣社會信任的主要事件為何？調查結果，排名第三的是「部分媒體與名嘴擴大藍綠對立」（29.6%），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名嘴的不信任，加深了台灣政黨對立惡鬥的亂象，也影響著閱聽人的感知（徐仁全，2015.06.01）。

關於媒體上的專家信任方面，王娟（2013）認為決策者、專家和民眾是政策制定中的三大主體，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主體內部和主體之間的關連性直接關係著決策能否順利制定與實施，民眾對政府和專家的信任是進行重大決策的重要基礎。然而，專家雖有其專業性，但民眾對專家並非皆會全盤信任。在政策風險中，專家建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以保證，方能獲得民眾對專家的信任，亦才能提升民眾對具有專家意見基礎的政策信任。

在媒體關注程度與風險感知方面，Leppin & Aro（2009）的研究認為民眾對風險議題的認知相當模糊；且對風險議題的判斷方式及後續對議題態度的判斷依據，除政治信任感外，很重要的因素是基於媒體新聞的注意程度。Giesbrecht（2007）則進一步認為，對於相關議題注意程度越高的閱聽人，對該議題所帶來的風險感知呈現較為擔心的傾向。在國內研究方面，陳憶寧（2011）也證實，新聞媒體的關注程度，確實相當程度影響社會大眾對於進口美國牛肉所帶來的風險感知。而 Chan & Lee（2014）的研究指出，風險議題研究亦須關注閱聽人對個別媒體使用習慣，例如閱聽人的媒體新聞注意程度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與風險接受能力。此外，許多研究結果發現，對特定媒體關注程度高及使用頻率越頻繁的閱聽人，越容易影響重要

他人的政策思考立場，並有較高的機會採取進一步的風險應對行為（Hänggli, 2012；Sill, Metzgar, & Rouse, 2013；Chan & Lee, 2014）。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索影響民眾透過媒體覺知社會議題中風險程度的重要因素，探究在面臨兩岸服貿議題時，媒體對台灣民眾的媒體信任程度與關注程度對風險感知的影響；與過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亦納入行為意圖作為驗證標的。此外，作者檢驗媒體信任程度時，也綜合考量不同媒體來源的信賴程度，包含對電視新聞信任程度、對報紙信任程度、對名嘴信任程度、對網路新聞信任程度。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1a： 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越高，則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研究假設 1b： 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越高，則行為意圖越高（拒絕購買大陸的服務商品與積極購買台灣本地商品）。

研究假設 1c： 民眾對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越高，則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研究假設 1d： 民眾對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越高，則行為意圖越高（拒絕購買大陸的服務商品與積極購買台灣本地商品）。

三、政治信任感與風險議題感知

「政治信任」指的是大眾相信「政治領袖會採取可能的行動來維護大眾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益」（Cappella & Jamieson, 1997）。Hetherington（1999）認為大眾對政治的信任是潛在生成的（potential heuristic），當民眾對於政治當局抱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時，便會相信當局將會遵守法律為人民謀福利；相反地，一旦權威當局行為並非以民眾為最後依歸，而卻是在圖個人利益時，大眾就會對政府產生懷疑態度（Dennis & Webster, 1975）。前述之政府當局，指稱的是政府成員與政府整體運作兩個層面；前者又區分為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後者包括政府整體與政府運作後所產出的公共政策（顏秀美，2003）。

在政治學的範疇中，政治信任是政治體制與政策延續的基礎保障，其泛指社會大眾對政府或是政黨運作的信念（Faith）（Rotter, 1971）。政治信任感的不彰或是低落，將會造成民眾賦予政府運作的

自由度降低，進而影響整體政府施政的順遂，連帶的，整個民主政治體制將會有種不穩定的表現。例如，Ladd（2010）的研究發現，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如果民眾政策議題上對媒體不信任，則會以其政黨傾向為主要判斷依據；而 Holian（2006）的看法則是，媒體與政府互相攻擊，並持不同意見時，民眾對政治的信任感及媒體的信任感會同步下降。

再者，Stokes（1962）從規範性的民主理論角度來探討群眾的政治信任問題，強調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必須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求，更強調政府官員的能力與操守。Stokes 同時表示政治信任是民眾對於政府評價的基本取向，其中評價標準一部份是倫理問題，像是對官員誠實程度的評價，而這些評價也擴展到其他能力，例如政府官員的能力、效率以及其決策的正確性。透過林嘉誠（1989）所總結政治信任感之定義，是對政府官員、政策、政治人物、政治現象，甚至政治典則、政治系統、政治結構的整體信任態度，也就是政府施政結果客觀的整體評價，同時反映出人民對政府在情感上的好惡程度。換言之，當社會大眾面對公共政策議題複雜且難以判斷時，常依賴政黨或是政府的信賴程度作為標準，作為判斷整體政策支持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

Lin（2009）針對美國群眾對伊拉克戰爭出兵的方式、目標、時程及戰爭進行的滿意程度調查時，發現美國群眾對美伊戰爭的支持與否的判斷依據，主要在於愛國心及對政府的信賴程度等因素。進言之，對執政的小布希政府政治信任程度較高的群眾，對支持政府派兵伊拉克的決定也呈現較正面肯定態度。以上的研究顯示，政治的信任程度對民眾對於政府施政，尤其是遭遇具爭議性且複雜的公共政策時的支持與否，有著重大的關聯性。

在台灣風險議題相關研究中，陳憶寧（2011）的研究發現，台灣的民眾在面對如美國牛肉進口與否等，具有風險性的社會議題時，本身對政治的信任傾向為判斷支持該議題與否的主要依據。尤其在政治信任的層面而言，越低的政治信任程度，通常伴隨著就是越高的風險感知層級。而彭芸（2004）也發現，台灣的閱聽大眾在面對公眾議題的判斷標準中，政治信任感對其立場的選定過程及對政策的支持與否的態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同時她也指出，新媒體的影響在公眾的議題傳播上，扮演著越發顯著的角色。故本研究將檢定閱聽人本身對

政治的信任感，與其感知政府簽訂兩岸服務貿協議的風險、風險接受程度與政策支持傾向的關聯性。

綜上所述，政治信任感以對象區分，可以劃分為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對民意代表的信任及對政府政策的信任等三大部分。就具有重大爭議公共政策的風險性而言，多數社會大眾並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以全盤了解整體政策對社會乃至國家現況的衝擊與影響。是故，媒體報導所提供的資訊遂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再者，如社會大眾對執行政策的政府機關信任感偏低，則其對風險的感知程度較強，也更難以產生正面的支持態度或行為。故本研究預測，在兩岸服務貿協議的議題中，政治信任程度將會產生不同的風險反應，也就是在政治信任程度較高的民眾，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將會抱持支持的態度，也比較不擔心協議實行後，對台灣產業的衝擊；而對政治信任度較低的民眾，則是持相反的態度，反映在行為的層面上，對此協議所進口商品與服務消費的意圖也較低。

綜合以上文獻整理，作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2a：政治信任感較高的民眾，對服貿協議的立場較為支持。

研究假設 2b：政治信任感較高的民眾，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接受程度較高。

四、民眾風險知識與議題感知

媒體風險傳播研究的初衷，主要著重探討媒體進行風險議題的傳播時，一般民眾對風險感知與態度形成因素的探索。風險感知方式的不同，將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後續對議題的行為反應與資訊尋求決定（McQuail, 1997）。例如，王嵩音（1995）針對科技風險議題與民眾認知落差研究時發現，民眾的認知途徑傾向採取簡化議題複雜度的方式決定。她也發現，這種簡化的認知處理方式來自民眾對議題原先的個人經驗、週遭可以參考的類似案例與媒體使用等，作為判斷參照標準。

除了前述的變項外，影響民眾對社會風險議題的感知與行為反應的相關的社會人口變項還有性別（黃懿慧，1994；Monberg, 1998；Graham & Johnson-Avery, 2013）、教育程度（朱元鴻，1995；

Giesbrecht, 2007 ; Gruzd & Roy, 2014) 等。舉例而言, Graham & Johnson-Avery (2013) 針對地方政府政策的社群媒體說服效果進行調查時發現, 男性相較於女性, 有更高的行為傾向運用包含 Facebook 在內的社群媒體參與地方政策, 主要的原因在於男性受訪者對於切身相關的地方政策推動展現較高的風險感知。

在教育程度方面, Gruzd & Roy (2014) 的研究發現, 教育程度較高的加拿大民眾, 對政府公共政策願意投以關注程度了解的比例較高, 但常伴隨著較高的風險感知, 對於為了公共政策議題而付諸行動的意願也越大。例如高教育程度的加拿大民眾對於長期將水力、與森林資源外銷的政策感到憂慮, 同時也有較大的比例走上街頭, 要求政府修正自然資源外銷的政策方針。綜上所述, 包含性別與教育程度都是民眾面對重大社會風險議題時, 表現出不同行為反應的判斷指標。兩者在社會與公共政策方面, 均正向預測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程度與後續行為傾向。

此外, 民眾對社會重大風險議題的知識程度高低, 也將影響其對於風險議題認知, 乃至後續採取進一步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 (Kim, Lan, & Lee, 2008.11)。進言之, 對問題的認知程度有限或是對風險現況有誤解, 會導致後續在進一步政策支持程度行為上有不同的效果。舉例而言, Ogata, Denham, & Springston (2006) 認為, 多數的受訪者對風險議題的客觀知識相當有限, 但主觀知識的高低程度, 會顯著影響其對於風險的感知程度, 並對後續是否產生行為的意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 則認為, 主、客觀知識程度均對社會大眾在感知風險程度上呈現正向影響; 然而, 在實際的行為意圖上, 客觀知識則扮演正向影響的指標。台灣的研究中, 易佳玲 (2011) 也指出, 政府透過媒體進行溝通的措施多數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民眾對議題的知識並不一定會隨著媒體的報導而增加, 導致後續民眾對於政策風險產生過高的認知偏差, 進而影響整體透過公民參與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綜上與主、客觀知識程度高低的風險傳播應用研究觀之, 整體風險傳播中, 知識程度有可能正向影響社會大眾的議題風險感知與相對應行為意圖。

此外, 新媒體網路上的討論區是否有影響社會大眾對議題的風險議題感知、接受程度及政策支持傾向的研究還是相對缺乏。少數相關

聯的研究有，韓智先（2001）認為，網路討論區上性別、教育程度、省籍不同的閱聽人，對議題風險的感知存在顯著差異。此研究認為，年輕族群較容易受到網路的媒體議題引導，進而對風險議題產生支持與否的立場，推論主要因為，年輕族群使用網路的時間較多，也投以較多的關注程度。從上述研究可以歸納，媒體新聞關注程度與年齡可以視作為風險議題傳播重要變項，再者，傳統媒體上，閱聽人對特定議題的立場亦是造成民眾議題風險感知、風險接受程度與政策支持意圖的成因之一，在網路討論區的媒體環境下，此成因依然存在。

綜上，可知對社會大眾而言，面臨重大風險議題時，民眾對重大社會議題的風險認知呈現知識較為有限，且對議題細節認知模糊的狀態。但論及民眾對議題支持與否的立場與政策行為意圖的決定時，其對特定議題相關知識的多寡、媒體新聞關注程度、性別、教育程度等重要變項都是判斷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電訪調查，檢驗台灣民眾對服貿協議的風險認知、接受程度，及探討後續資訊尋求與政策支持行為的交叉關係時，將納入上述的重要變項作為分析架構。

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3：民眾對服貿協議的知識程度越高，其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越高。

研究假設 4：性別與教育程度正面預測民眾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與調查執行過程與樣本概述

本研究以調查法，委託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電腦輔助電話號碼抽樣的系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調查時間為 201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進行問卷前測。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起，至 2015 年 11 月 21 日止，合計 6 天執行正式訪問。正式施測期間為立法院會審議兩岸服貿協議的先導法案，也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審查期間，在立院的攻防引起相當的關注報導。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以「中華電信 104 年度住家版電話簿」為主要抽樣架構；依據各縣市所登載的電話數量設定

樣本分配的參照比例，並以系統抽樣的方式每 10 個號碼抽出一戶受訪對象，以台灣地區年滿 20 歲及以上中華民國國民為主，電話撥通後由訪員進行戶內抽樣，以電話問卷的方式進行約 10 分鐘的獨立樣本訪問。

本次訪問合計取得 1,269 個有效樣本。以 95% 的信賴區間做估計，最大的抽樣誤差為 $\pm 3\%$ 。在調查執行期間，撥打 6,043 通電話，受訪成功率約為 27%。為求樣本對母群體的代表性，本研究依據內政部公布「103 年人口靜態統計」數據中，的居住地區、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的分布特性進行反覆加權。反覆加權過後的結果顯示，抽樣所取得的受訪者分布特性與母群體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詳細樣本分布請見表 1：受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表 1：受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性別	男性 <i>n</i> =632	女性 <i>n</i> =637			
年齡	20-29 歲 <i>n</i> =169	30-39 歲 <i>n</i> =297	40-49 歲 <i>n</i> =411	50-59 歲 <i>n</i> =301	60 歲以上 <i>n</i> =91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i>n</i> =47	國、初中 <i>n</i> =295	高中職 <i>n</i> =223	大學與大專 <i>n</i> =457	研究所以上 <i>n</i> =247
居住地	北部 <i>n</i> =510	中部 <i>n</i> =404	南部 <i>n</i> =326	東部 <i>n</i> =2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測量變項

參照前述文獻探討中，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包含媒體信任、政治信任、新聞關注程度、對服貿協議的知識、人口統計變項等。而依變項則是包含風險感知；服貿政策立場；風險接受程度；行為意圖。以下分別說明主要自變項測量方式。

（一）政治信任感

本研究以經濟風險與收益的脈絡下，依照研究目的，提出政治信任與經濟風險及利益的同意程度，即測量受訪者在評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議與簽訂過程中，以 Likert 5 點量表，分別為「非常不相

信」、「不相信」、「普通」、「相信」、「非常相信」，回答對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政府政策、電視新聞、節目名嘴、報紙、網路上的服貿相關新聞。

其中有關政治信任的題項本研究依據前述文獻研析與整理，援引顏秀美（2003）以及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2008）的研究測量，納入對政府官員信任感、對民意代表信任感及對政府與政策之信任感等三個構面來發展本研究的研究問項，並以五點 Likert 量表進行填答，分別為「1 = 非常不同意」、「2 = 有點不同意」、「3 = 普通」、「4 = 有點同意」、「5 = 非常同意」。

構面一：對政府官員信任感

(1) 我們的政府官員十分關心人民的意見；(2) 我們的政府首長在做決定時，通常都是公正無私的；(3) 政府官員都是精明能幹的，並對自己的工作有充分的認識。

構面二：對民意代表信任感

(4) 大部分的民意代表都有足夠的能力去擔負民意代表的職責；(5) 我們的民意代表在決定各種法案時，都是為大眾的利益著想；(6) 我們可以相信議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是正確的。

構面三：對政府與政策之信任感

(7) 我們的政府是為全民謀福利的；(8) 如果人民遇有困難的問題，政府會設法幫助我們；(9) 經由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會盡力去實現競選時的承諾。

建構政治信任的方式，將 9 個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政治信任的程度越高 ($M = 2.17$, $SD = 0.93$)，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524$, $p < 0.01$)，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二) 媒體信任感

在媒體信任感方面，研究者另外以「您相不相信電視新聞上對服貿影響台灣的報導？」；「您相不相信談話節目名嘴對服貿影響台灣的說法？」；「您相不相信報紙上對服貿影響台灣的報導？」；「您相不相信網路上新聞對服貿影響台灣的說法？」等題項，檢驗受訪者

對不同傳播資訊來源的服貿議題信任程度。建構媒體信任的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媒體信任的程度越高 ($M = 2.12$, $SD = 0.71$)，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557$, $p < 0.5$)，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三) 服貿協議的知識變項

陳憶寧(2011)認為，探討重要社會議題的風險傳播時，閱聽人的主、客觀知識程度對風險感知將有不同的影響。本研究除檢驗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外，亦將行為意圖納入研究重點。客觀知識方面，參考行政院「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文本」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三個選擇題，包含「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範圍？」：(1) 美容美髮業、(2) 印刷業、(3) 出版業；「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配套措施有哪個？」：(1) 緊急磋商機制、(2) 國內產業補貼機制、(3) 國外啟動基金；「兩岸服務貿易罰則包含哪個？」：(1) 取消特許、(2) 取消補貼、(3) 易科罰金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客觀知識計分方式為答對題項之加總計分。

另外以「您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對台灣的影响瞭不瞭解？」測量受訪者的主觀知識。選項有「非常不瞭解」、「不瞭解」、「普通」、「瞭解」、「非常瞭解」。

(四) 媒體新聞注意程度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的媒新聞注意程度 題項為五點 Likert 量表，分別為「1 = 非常不注意」、「2 = 有點不注意」、「3 = 普通」、「4 = 有點注意」、「5 = 非常注意」的三個主要新聞媒體的問題。

「請問您在報紙新聞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上的注意程度為？」；「請問您在電視新聞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上的注意程度為？」；「請問您在網際網路新聞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上的注意程度為？」。

(五) 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項與其他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齡為開放式填答，再由研究者重新歸類為 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以及 60 歲以上；教育程度則設定為「小學及

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學與大專」、「研究所以上」。而居住地區歸類方式則是，大台北地區、桃、竹、苗歸類為北部地區；中、彰、投地區歸類為中部；雲、嘉、南、高雄、屏東歸類為南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則歸類為東部地區。

在依變項方面，說明如下：

（一）風險感知變項

研究者調查「您認為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的經濟的影響是？」，選項有「非常傷害」、「有傷害」、「有利益」、「非常有利益」、「不清楚」、「拒答」；「您擔不擔心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台灣的經濟不能歸由自己掌控？」；「您擔不擔心沒辦法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使經濟衰退？」，選項為「非常擔心」、「擔心」、「不擔心」、「非常不擔心」、「不清楚」、「拒答」。建構風險感知的方式，將第一題的計分反向編碼後，再行與二、三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低，表示風險感知的程度越高（ $M = 1.06$ ， $SD = 0.83$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600$ ， $p < 0.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二）服貿政策立場變項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如果說您可以決定要不要簽訂服貿協議，您會選擇支持，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整體來說，您是贊成簽訂兩岸服貿協議的，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建構服貿立場的方式則是將兩題相加後除以二，所得分數越高，越是同意簽訂兩岸服貿協議（ $M = 2.51$ ， $SD = 0.97$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701$ ， $p < 0.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三）風險接受程度變項

在風險接受程度方面，研究者詢問「簽訂服貿協議後台灣受到好處的產業多於受到傷害的產業，但也有可能讓一些產業受到損失，請問您對服貿協議的接受程度如何？」及「兩岸服貿協議簽訂後台灣受到好處的機率多於受到傷害的機率，但也有受到傷害的機會，請問您對服貿協議的接受程度如何？」。選項有「非常不能接受」；「不能

接受」；「普通」；「能接受」；「非常能接受」。建構風險接受程度的方式則是，將兩題相加後除以二，所得分數越高，越是能接受簽訂兩岸服貿協議的風險（ $M = 2.96$ ， $SD = 1.02$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621$ ， $p < 0.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四）行為意圖變項

研究者建構受訪者對服貿協議相關的行為意圖包含「會不會因為政府簽訂服務貿易協議而拒買大陸產業進口的服務與商品？」；「會不會因為政府簽訂服務貿易協議而多買台灣受衝擊產業的服務與商品？」，選項為「非常不可能」、「不可能」、「普通」、「可能」、「非常可能」。建構服貿協議的行為意圖方式則是將兩題相加後除以二，所得分數越高越是會以實際行動來支持服貿協議（ $M = 3.03$ ， $SD = 0.95$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分析（ $r = 0.635$ ， $p < 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綜上所述，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信度檢核時，所有量表均大於 0.5，呈現中、高度相關特質，顯示問卷題項具備內在一致性。

四、效度檢測

本研究量表之建構效度以因素分析檢測。研究量表各變項之 KMO 值及 Bartlett 球形檢定結果如下：「政治信任」KMO 值 0.85，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636.21（ $p < 0.001$ ）；「媒體信任」KMO 值 0.79，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601.25（ $p < 0.05$ ）；「風險感知變項」KMO 值 0.77，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711.59（ $p < 0.001$ ）；「服貿政策立場變項」KMO 值 0.88，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819.27（ $p < 0.001$ ）；「風險接受程度變項」KMO 值 0.86，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907.28（ $p < 0.001$ ）；「行為意圖變項」KMO 值 0.79，Bartlett 球形檢定值 510.50（ $p < 0.001$ ）。各變數 KMO 值均大於 0.7，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值均達顯著水準（ $p < 0.05$ ），適合因素分析。

研究量表以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變異轉軸法因素分析，萃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政治信任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 87.63%；風險感知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 91.95%；服貿政策立場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 89.30%；風險接受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88.27%；行為意圖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86.19%，研究量表效度良好。

肆、資料分析與驗證

一、描述性統計

(一) 政府與媒體信任感

其中有關政府信任的題項方面，構面一，對政府官員信任感方面，回答非常不同意 18.5%、有點不同意 32.7%、普通 20.9%、有點同意 10.1%、非常同意 17.8%；構面二，對民意代表信任感方面平均回答非常不同意 49.9%、有點不同意 18.2%、普通 15.7%、有點同意 10.7%、非常同意 5.5%；構面三，對政府與政策之信任感方面，平均回答非常不同意 10.8%、有點不同意 51.2%、普通 30%、有點同意 5.2%、非常同意 2.8%。在整體政治信任感構面中，台灣民眾對政府官員、民意代表與政府政策普遍都缺乏信任，每一構面都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不同意程度從 51.2% 到 68.1% 不等，其中，又以對民意代表的信任程度最低。

然而在電視新聞的信任度方面，回答非常不相信有 7.3%、不相信有 45.2%、普通有 30.9%、相信有 15.5%、非常相信有 1.2%；而談話節目的名嘴方面，回答非常不相信有 12%、不相信有 38.3%、普通有 30.2%、相信有 18.8%、非常相信有 0.7%；至於報紙新聞方面，回答非常不相信有 3.8%、不相信有 23.9%、普通有 52.4%、相信有 19.1%、非常相信有 0.8%；最後在網路網友方面，回答非常不相信有 9.8%、不相信有 36.7%、普通有 40%、相信有 12.1%、非常相信有 1.4%。

(二) 服貿協議的知識

客觀知識方面，詢問「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範圍？」的題項中，正確回答的有 32.2%；「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配套措施有哪個？」的題項中，正確回答的有 30.7%；「兩岸服務貿易罰則包含哪個？」的問項中，正確回答的有 26.3%。

主觀知識方面，詢問「您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對台灣的影響瞭不瞭解？」題項中，回答「非常不瞭解」的有 5.6%、「不瞭解」47.9%、「普通」26.5%、「瞭解」17.4%、「非常瞭解」2.5%。可知有只有三成的受訪者了解服貿協議的客觀知識，同時也有 53.3% 的

民眾主觀認為自己不了解服貿協議的內容。

（三）媒體新聞注意程度

受訪者回答對電視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注意程度中其中回答「非常注意」有 21.4%、「有些注意」有 42.8%、「普通」有 10.5%、「不注意」有 17.0%、「非常不注意」有 8.3%；在報紙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的注意程度方面，回答「非常注意」有 17.5%、「有些注意」有 34.8%、「普通」有 8.8%、「不注意」有 17.9%、「非常不注意」21.0%；在網路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議題的相關報導方面，回答「非常注意」有 18.2%、「有些注意」38.0%、「普通」有 7.7%、「不注意」有 20.0%、「非常不注意」有 16.2%。

可知透過電視媒體引發關注程度的比例最高（64.2%），其次是網路（56.2%），最後是報紙媒體（52.3%）。可以確認的是，媒體在服貿協議簽訂及其所引發的太陽花運動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不論是何種媒體，都有超過一半比例的機會引發閱聽人的關注。

（四）風險感知

在風險感知方面，題項「您認為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的經濟的影響是？」中，其中回答「非常傷害」14.0%、「有傷害」44.3%、「有利益」30.9%、「非常有利益」5.9%、「不清楚」6.2%；而在「請問您擔不擔心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台灣的經濟不能歸由自己掌控？」的題項，其中回答「非常擔心」35.6%、「有擔心」40.8%、「不擔心」15.3%、「非常不擔心」8.3%、「不清楚」0.8%；最後是「請問您擔不擔心政府無法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使經濟衰退？」，其中回答「非常擔心」10.6%、「有擔心」41%、「不擔心」38.7%、「非常不擔心」9.7%、「不清楚」0.2%。上述前兩題是詢問受訪者對於簽訂服貿協議後的傷害，發現有 58.3% 到 76.4% 的受訪者表示擔心簽訂後對台灣產業的衝擊；然而，最後一題詢問受訪者擔不擔心不簽服貿協議的風險，也有超過 50% 的民眾表示擔心，顯見不論服貿協議的簽訂與否，台灣民眾都保持一定的風險感知程度。

（五）服貿政策立場

本研究在服貿協議的政策立場上，詢問受訪者「有人說：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台灣經濟情況會向上提升，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的題項中，回答「非常不同意」有 9.7%、「不同意」40.5%、「普通」10.1%、「同意」30.3%、「非常同意」9.4%；在詢問「整體來說，您是贊成簽訂兩岸服貿協議的，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回答「非常不同意」5.6%、「不同意」47.9%、「普通」26.5%、「同意」17.4%、「非常同意」2.5%。可知民眾對服貿協議的政策立場是中立偏向不贊成者居多。

（六）風險接受程度變項

在風險接受程度方面，研究者詢問「簽訂服貿協議後台灣受到好處的產業多於受到傷害的產業，但也有可能讓一些產業收到損失，請問您對服貿協議的接受程度如何？」的問項中，回答「非常不能接受」20.4%、「不能接受」47.2%、「普通」17.4%、「能接受」10.9%、「非常能接受」4.1%；而「兩岸服貿協議簽訂後台灣受到好處的機率多於受到傷害的機率，但也有受到傷害的機會，請問您對服貿協議的接受程度如何？」的題項中，回答「非常不能接受」9.1%、「不能接受」32.6%、「普通」40.5%、「能接受」11.9%、「非常能接受」5.9%。

（七）行為意圖

研究者詢問服貿協議相關的行為意圖中，第一題「請問您會不會因為政府簽訂服務貿易協議而拒買大陸產業進口的服務與商品？」回答「非常不可能」11.4%、「不可能」48.0%、「普通」15.8%、「可能」14.8%、「非常可能」10.0%；而「請問您會不會因為政府簽訂服務貿易協議而多買台灣受衝擊產業的服務與商品？」回答「非常不可能」3.8%、「不可能」23.5%、「普通」17.8%、「可能」36.5%、「非常可能」18.4%，可知有超過 24% 的國民有傾向不消費大陸產的商品的行為意圖，更有超過 54% 的民眾願意付諸行動，增加購買台灣產品的行為。

二、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與問題，探究包含媒體信任、政治信任、服貿議題的知識、媒體新聞注意程度、人口統計變項等多個自變項與依變項（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服貿協議的風險接受程度及行為意圖）間的關聯性。以迴歸分析檢驗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聯性時，自變數被設定為依變數的因素，如檢驗結果呈現顯著時，則可判斷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效果（Hardin, 2001）。

為確保研究統計結果之效度，研究者在進行迴歸分析後，均以「容忍值」（Tolerance）與「變異數膨脹因素」（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n）檢驗變項間的共線性。統計實務上，容忍值大於 0.1；VIF 小於 10 是檢驗共線關係是否存在的判定標準（Belsley, 1991）。

研究假設 1a 與 1b：

研究假設 1a 與 1b 分別檢驗國民對媒體信任感的高低程度與風險感知及其後續行為意圖的關聯性。迴歸分析檢視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高低程度與風險感知程度時，發現受訪者對新聞媒體的信任程度，與其對風險感知有部分顯著關聯。其中對談話節目名嘴（ $\beta = 0.294, p < 0.001$ ）、網路新聞（ $\beta = 0.255, p < 0.001$ ）與報紙新聞（ $\beta = 0.249, p < 0.01$ ）的信任程度正面預測服貿協議風險感知，而電視新聞（ $\beta = -0.075, p = 0.154$ ）則無顯著相關。

再者，檢驗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高低程度與行為意圖時，四種不同新聞媒體的信任程度均與行為意圖呈現顯著關聯性，其中對電視新聞信任程度（ $\beta = -0.114, p < 0.05$ ）、節目名嘴（ $\beta = 0.152, p < 0.01$ ）、報紙新聞（ $\beta = 0.113, p < 0.01$ ）與網路新聞（ $\beta = 0.166, p < 0.001$ ）的信任程度均正面預測受訪者的行為意圖。共線性檢核的結果顯示，Tolerance 值為 0.54，媒體信任感各題項間，沒有共線關係。

換言之，研究假設 1a 與 1b 部分成立，對節目名嘴、報紙新聞與網路新聞信任程度越高的民眾，認為服貿議題衝擊程度越嚴重；進一步討論後續行為意圖時，本研究發現，對電視新聞、報紙新聞、名嘴與網路新聞程度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產生抵制大陸商品及多消費台灣商品的行為意圖。詳細資訊請見表 2：媒體信任程度迴歸分析表。

表 2：媒體信任程度迴歸分析表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i>SE B</i>	β	<i>SE B</i>	β
對電視新聞信任程度	0.032	-0.075	0.065	0.114
對節目名嘴信任程度	0.032	0.294	0.064	0.152
對報紙新聞信任程度	0.035	0.249	0.070	0.113
對網路新聞信任程度	0.029	0.255	0.059	0.166
R^2	0.364		0.255	
<i>Adj R</i> ²	0.172		0.165	
<i>F</i>	20.497		6.846	
<i>df</i>	(6, 1,253)		(6, 1,253)	

註：N=1,26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研究假設 1c 與 1d：

Chan & Lee (2014) 的研究認為，個人的媒體使用習慣與使用程度，對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有相互影響的可能；Mou & Lin (2014) 也持相同的立場，認為大眾使用關注特定媒體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影響大眾的議題立場。本研究除了檢視大眾的媒體關注程度與其風險感知間的關聯性外，亦加入行為意圖，嘗試將其原有的理論框架向前延伸。

研究假設 1c 與 1d 分別檢驗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的高低程度與整體風險感知及其後續行為意圖的關聯性。迴歸分析檢視民眾對新聞媒體的關注程度與風險感知程度時，發現受訪者對電視新聞 ($\beta = 0.168, p < 0.01$) 與網路新聞 ($\beta = 0.121, p < 0.01$) 的關注程度正面預測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在行為意圖方面，對電視新聞 ($\beta = 0.192, p < 0.05$) 與網路新聞 ($\beta = 0.222, p < 0.01$) 愈關注的受訪者，愈有可能在簽訂服貿後有相關後續行為，也就是越有可能產生抵制大陸商品及多消費台灣商品的行為意圖。共線性檢核的結果顯示，Tolerance 值為 0.75，意味著新聞關注程度各題項間，沒有共線關係。

整體而言，研究假設 1c 與 1d 部分成立，民眾對電視與網路服貿相關新聞關注程度，正向預測其對後續產生的風險感知，並且越有可能產生抵制大陸商品及多消費台灣商品的行為意圖。詳細分析數據見表 3：新聞關注程度迴歸分析表。

表 3：新聞關注程度迴歸分析表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i>SE B</i>	β	<i>SE B</i>	β
對電視新聞關注程度	0.028	0.168	0.053	0.192
對報紙新聞關注程度	0.021	0.018	0.040	0.011
對網路新聞關注程度	0.021	0.121	0.039	0.222
R^2	0.264		0.227	
<i>Adj R</i> ²	0.198		0.164	
<i>F</i>	1.167		4.936	
<i>df</i>	(6, 1,262)		(6, 1,262)	

註：N=1,269 **p* < 0.05, ***p* < 0.01, ****p* < 0.001

研究假設 2a 與 2b：

研究假設 2a 與 2b 分別檢驗國民對政治信任感的高低程度與風險感知及其後續行為意圖的關聯性。Bousfield, Cook, & Roesch (2014) 的研究認為，民眾在判斷具有風險且結構複雜的議題時，常無法形成系統的思考與衡量，而是以對政黨或是政府的信任感決定其立場。Lin (2009) 的研究也呼應此觀點，發現美國民眾在感知出兵伊拉克風險時，對政府信賴的民眾認為可以接受出兵的風險程度，並且，在行為意圖上也會偏向政府的立場。

Holian (2006) 的研究認為，民眾的政黨傾向常是決定公共政策支持與否的重要判斷因素；在國內研究方面，彭芸 (2004) 也認為，台灣的民眾在判斷公眾議題的支持與否時，政治信任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政治信任感越高的民眾對服貿協議的立場呈現正面預測的結果 ($\beta = 0.292, p < 0.001$)；相同的，政治信任感越高的民眾對於簽訂服貿協議後的風險接受程度也呈現顯著

增長的態樣 ($\beta = 0.322, p < 0.001$)。檢驗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2a 與 2b 的預測。詳細分析數據見表 4：政治信任感迴歸分析表。

表 4：政治信任感迴歸分析表

	政策立場		風險接受程度	
	<i>SE B</i>	β	<i>SE B</i>	β
政治信任感	0.029	0.292	0.033	0.322
R^2	0.458		0.502	
<i>Adj R</i> ²	0.391		0.416	
<i>F</i>	1.149		1.163	
<i>df</i>	(6, 1,262)		(6, 1,262)	

註：N=1,269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研究假設 3：

本假設認為民眾對服貿協議的主、客觀知識程度，可正向預測其風險感知程度與政策行為意圖。從描述性統計的結果觀之，僅有 3 成左右的受訪者對於服貿協議的客觀知識表現較為熟悉；然而，有超過 50% 的受訪者在服貿協議的主觀知識中，認為自己對服貿的了解沒有足夠的深度；但卻也有超過 75% 的受訪者對簽訂協議與否的態度有自己的立場。O'Brien (2009.11) 認為，對風險議題客觀知識了解程度越高的群眾，越能夠獨立判斷風險議題的得失。本研究同時以風險感知與政策行為意圖作為檢驗重點。經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客觀知識無法預測社會大眾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 ($\beta = 0.050, p > 0.5$) 與行為意圖 ($\beta = 0.085, p > 0.5$)；然而主觀知識方面，除可以正向預測受訪者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 ($\beta = 0.335, p < 0.01$) 外，也同時正向預測受訪者的行為意圖 ($\beta = 0.371, p < 0.001$)。共線性檢核的結果顯示，Tolerance 值為 0.34，顯示主、客觀知識間，沒有共線關係。換而言之，社會大眾在主觀上，越是自認為對服貿協議了解的群眾，認為服貿協議簽訂的風險越高，並且具備越高的抵制大陸商品與多消費本國商品的行為意圖。故研究假設 3 部分成立。詳細分析數據見表 5：主客觀知識迴歸分析表。

表 5：主客觀知識迴歸分析表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i>SE B</i>	β	<i>SE B</i>	β
主觀知識	0.287	0.335	0.310	0.371
客觀知識	0.015	0.050	0.011	0.085
R^2	0.294		0.295	
<i>Adj R</i> ²	0.272		0.203	
<i>F</i>	1.22		3.36	
<i>df</i>	(6, 1,262)		(6, 1,262)	

註：N=1,269 **p* < 0.05, ***p* < 0.01, ****p* < 0.001

研究假設 4：

Monberg (1998) 與黃懿慧 (1994) 的研究都認為性別的差異，在感知社會風險的程度上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落差；Graham & Johnson-Avery (2013) 則認為在地方政策上的行為意圖男性較女性有較高的行為傾向。本研究則著重於檢驗探討不同性別間對簽訂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包含抵制大陸商品與多消費台灣商品的行為意圖之關聯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風險感知方面，男性與女性並沒有顯著差異 ($\beta = 0.112, p > 0.05$)；然而在行為意圖方面，男性呈現較女性強的行為意圖 ($\beta = 0.265, p < 0.01$)。

陳憶寧 (2004) 與朱元鴻 (1995) 的研究都曾確認，在風險議題傳播中，社會大眾的教育程度有可能會影響其風險感知程度。Gruzd & Roy (2014) 則認為高教育程度在公共政策方面，有可能伴隨著較高程度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本研究除檢視風險感知程度外，亦探討後續行為意圖的差異。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簽訂服貿相關議題方面，教育程度負面預測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 ($\beta = -0.366, p < 0.001$)，但在行為傾向方面則沒有差異 ($\beta = 0.160, p > 0.05$)。進言之，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對簽訂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較低。然而，在行為意圖方面，教育程度並無法提供有效的預測結果。詳細分析數據見表 6：性別與教育程度迴歸分析表。

表 6：性別與教育程度迴歸分析表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i>SE B</i>	β	<i>SE B</i>	β
性別 (男=1；女=0)	0.025	0.112	0.030	0.265
教育程度	0.031	-0.366	0.017	0.160
R^2	0.375		0.299	
<i>Adj R</i> ²	0.241		0.162	
<i>F</i>	5.167		15.638	
<i>df</i>	(7, 1,261)		(7, 1,261)	

註：N=1,269 **p* < 0.05, ***p* < 0.01, ****p* < 0.001

伍、結論與討論

我國政府於 2014 年企圖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其在立法院付委的行動，在社會上引起重大社會關注。更甚者，直接影響了佔領立法院的「318 太陽花學運」。學生與社運團體要求政府退回原有的服貿協議，並先行制定相關監督機制。前述由媒體機構在當時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的國民對服貿協議的內容並沒有足夠的了解，不過卻對服貿協議本身產生了特定支持或是反對的立場。從 Beck (1986/1992) 的風險社會與媒體的論述，及台灣相關的傳播研究 (彭芸, 2004；陳憶寧, 2011；王娟, 2013) 可知，媒體的傳播是民眾面對特定的風險議題時，用以感知風險程度、決定風險接受程度與產生應對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企圖檢視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本身的政治信任感、對風險議題的知識程度、及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等風險傳播的重要因素中，是否對特定議題的風險感知、風險接受程度，與政策相關的行為意圖造成影響以探索服貿議題在建構與傳播的過程中媒體的影響程度。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除政治信任外，媒體信任也是另一個檢視議題形成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多數的社會大眾都依賴媒體感知公共政策的現況下，媒體的報導論述方式，對重要公共政策如何形成社會輿論的影響動見觀瞻。詳言之，在服貿協議此重大社會議題的傳播過程中，媒體確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名嘴、報紙新聞與網路新聞的信任程度，都正面預測服貿協議簽訂的風險感知，也就是越信任

上述媒體，認為服貿協議對台灣的衝擊越大；再者，對電視、名嘴、報紙、網路等新聞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也都正面預測了受訪者後續是否採取相對應的行為，包含盡量不買大陸商品與多消費本國商品的行為意圖。此結果符合 Bousfield et al. (2014) 的研究推論，認為多數民眾面對複雜的風險議題時，常以信任感作為評斷本身立場的關鍵因素。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對電視新聞的信任程度並無法顯著影響社會大眾對服貿協議簽訂的風險感知。從本研究調查的媒體信任程度觀之，社會大眾對電視新聞的信任感最低，約有 52.5% 的受訪者對於電視新聞中，所報導的服貿議題表達非常不信任或不信任。彭賢恩、張郁敏 (2008) 針對電視新聞可信度的研究也顯示，我國民眾批評電視新聞充斥色情與暴力內容，並且對犯罪情節的描述又過於聳動，所以整體信任感偏低，同時亦影響民眾對於風險感知的真實性。

在媒體新聞關注程度方面，本研究發現比較關注電視與網路新聞上，有關兩岸服貿協議新聞的受訪者，呈現對簽訂協議後表現出較為強烈的風險感知，並且呈現較高的抵制大陸商品與多購買台灣商品的行為意圖；值得一提的是，對報紙新聞關注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與後續的行為意圖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其差異可能來自報紙媒體與其他媒體使用族群的不同，換言之，過去數年來台灣報紙產業的閱聽人有的共同特色之一，就是平均教育水準高於廣播與電視媒體的使用者 (林思平，2016)。而本研究檢視教育程度與風險感知重要性時，也呈現了教育程度越高，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越低的現況。從此觀之，服貿協議簽訂與否這個重大社會議題在傳播的過程中，對電視新聞與網路新聞關注程度較高的社會大眾，同時在風險感知程度與後續的行為意圖產生一致的影響效果。

在政治信任感相關的檢驗方面，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政治信任感，除了顯著預測民眾對服貿議題所持的立場外，亦與風險接受程度有著顯著的關聯性。換言之，民眾的政治信任程度在面臨風險議題時，會成為其決定自身立場的參考依據，此外，亦會正向預測風險發生的接受程度。此結果也驗證了 Chan & Lee (2014) 的研究，渠等認為，民眾面對風險議題時的風險接受程度，與其對所信賴的政治的立場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討論民眾對風險議題的主、客觀知識與風險感知關係時，過去的研究無法呈現有系統的結論。例如 Kim et al. (2008.11) 的研究認

為，社會大眾對議題的知識高低，將影響民眾在風險議題所持的立場；而陳憶寧（2011）的研究則是分別檢驗民眾對風險議題的主、客觀知識，與其政策立場的關聯性。她發現，民眾的主觀知識並不會比客觀知識來的能夠預測受訪者的政策立場。

但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往相左，結果顯示在簽訂服貿協議的議題中，民眾的主觀知識，亦即認為自己對服貿議題的了解程度，相較客觀知識而言，較能夠預測受訪者對風險感知程度以及其後續的行為意圖。換言之，受訪者越自認為對服貿協議了解的程度越高，越認為簽訂服貿協議具有高度風險，同時，對多消費在地商品與抵制大陸商品的意圖也較高。然而客觀知識程度的高低卻無法有效預測受訪者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其可能原因是，相較於客觀知識而言，主觀知識程度的高低來自受試者的自我感知與評估。然而，各種媒體的報導亦是主觀知識重要來源。如閱聽人對於媒體的信任感與關注程度具備某主程度的偏好，不易全盤了解複雜且涉及產業多元的服貿協議的內容。所以可能呈現主觀知識程度，對服貿協議的風險感知程度與風險相關的後續行為意圖產生影響；然而代表著深入了解服貿協議實質內容的客觀知識較高的閱聽人而言，因為議題的複雜程度高，相對較難產生肯定的行為意圖。本研究的對主、客觀知識的檢驗，促使原有的風險傳播理論架構更進一步，嘗試觸及對行為方面的解釋能力。

再者，人口變項是許多探討風險傳播的研究都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例如韓智先（2001）即認為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都是造成風險感知程度不同的因素；而 Sill et al.（2013）認為教育程度高的閱聽人，通常可較為深入了解風險議題的細節後，再行決定立場。本研究則發現，雖然男性與女性間對於服貿的風險感知程度沒有顯著差異，但相較於女性而言，男性受訪者在簽訂服貿協議後，產生相對應的行為意圖也較高，這樣的研究結果也驗證了 Graham & Johnson-Avery（2013）的調查結果，男性在風險議題中，展現較高的行為意圖的結論。至於男、女受訪者在風險程度感知上沒有顯著差異的可能原因是，服貿議題在我國屬於高度社會關注的重大社會與經貿議題，在各種媒體強力且長期的播送下，可能縮減不同性別間認知程度的差異；此外，教育程度高的受訪者認為服貿協議的風險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此一論點也與朱元鴻（1995）檢驗台灣民眾面對環境變遷議題時的風險感知研究成果相互呼應。該研究提及，學歷越高的社會大眾，

通常面對社會風險事件的「科技理性」越高，連帶著降低其對於風險嚴重程度的感知。換言之，學歷高的民眾較有追求風險事件背後的因果邏輯與真相的能力與動機，進而影響其風險感知程度。

本研究主要目的除探討簽訂兩岸服貿協議此內容複雜與引起重大社會爭議的議題過程中，媒體信任感、政治信任感與新聞關注程度如何影響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接受程度等重要因素外；也企圖延伸原有的理論架構，進一步討論了民眾抵制協議中所列大陸商品服務與支持台灣本地商品的行為意圖。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是驗證媒體的信任程度與關注程度在服貿議題的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除影響民眾對於風險議題重要性的評估外，也預測其後續行為意圖。此外，有系統的探索了不同人口變項、政治信任，在與新聞關注程度的相互作用下，影響民眾對重大風險議題的感知、風險接受度與行為意圖。本案的調查執行期間，是立法機關正在處理與兩岸服貿協議高度相關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時，故受訪者平時所接觸的媒體內容，對已發生的 318 學運，及當初兩岸服貿協議付委時所造成的影響與肇生的風波都能有一定程度的回憶能力，對風險議題的反饋與回應相當及時與真切。

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方面，首先要討論的是，雖然本研究檢驗了社會大眾的媒體新聞關注程度，及對不同媒體來源的新聞關注。然而，卻未能探討這些種類多元新聞來源的新聞框架。陳憶寧（2011）進行美國牛肉風險傳播的研究中曾證實，台灣政黨色彩鮮明的媒體立場，所產製的新聞立場迥異，這些立場的新聞框架可能與民眾的媒體注意程度產生互動，進而造成越注意特定媒體的民眾，對風險議題的看法與立場，也會偏向特定媒體的框架，故在後續的研究中，可嘗試將媒體框架納入討論。其次，囿於計畫核准時程等因素影響，本研究施測距離服貿爭議已逾一段時間，期間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更可能影響我國民眾對服貿議題的風險感知情形，雖然作者在施測時間的選擇上，選擇立法院審議服貿相關條例期間進行調查，期望盡量減低因為發生時間過久而影響受試結果的可能性，建議後續研究主軸則可進一步探討在不同時間與政策情境下，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及議題後續發展脈絡的關連性。

再者，本研究調查新聞注意程度與媒體信任程度時，乃使用受訪者自我評估的方式，在回憶能力與感知事實方面，確實在自陳問卷的

填答過程中，存有與事實出入較大的風險。建議未來研究檢驗受訪者的新聞注意程度時，可以運用準實驗法等方式，讓受訪者在較為接近平時媒體使用習慣的情境下，準確紀錄媒體使用行為與暴露程度等數據，以增進研究參考價值。

本研究設定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相關法案時，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民意調查，其目的除檢驗當今台灣社會中，媒體對民眾的風險感知、立場、接受程度乃至於行為意圖的影響能力與範圍，以為政策執行與公民運動行動者兩方，都提供了媒體與社會間的關聯網絡一個直觀的描繪外，研究者也認為，台灣社會的重要社會議題中，兩岸服貿協議不會是最後一個議題，未來如何運用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影響力，凝聚全民共識與減少社會內耗，才是本研究最終的目的與信念。

註釋

- 〔1〕《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台灣承諾對中國開放的項目計有：
- 一、生產者服務（商務和專業服務業、金融服務業等）如（1）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a. 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之諮詢服務、b. 軟體執行服務、c. 資料處理服務、d. 資料庫服務、e. 其他；（2）廣告服務業（廣播電視廣告業除外）；（3）市場研究服務業；（4）管理顧問服務業；（5）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業——車輛、機械、電機、電子、化工、度量衡、酒類產品及環境檢測的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6）附帶畜牧業之顧問服務業。
 - 二、消費者／生活型服務（即個人服務，包括旅館、餐飲業等）如視聽服務業電影或錄影帶之行銷服務業——進口大陸電影片。
 - 三、流通服務（分銷或分配服務，包括零售業、批發、交通運輸業、通信業等）如運輸服務業：（1）海運服務業——海運輔助性服務業（港埠業、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理貨業、船舶小修業）；（2）空運服務業——空運服務之銷售及行銷、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3）公路運輸服務業——旅客運輸（限於小客車租賃業）、貨物運輸、公路運輸設備維修、公路運輸支援服務業（限公路客

運的轉運站、車站、調度站)、公路運輸支援服務業(限公路橋樑及隧道管理);(4)公路運輸支援服務業(限停車場業);(5)空中纜車運輸服務各類運輸之輔助性服務業;(6)倉儲服務業;(7)貨運承攬服務業。

四、社會服務(政府部門、醫療、健康、教育、國防)如健康與社會服務業:(1)醫院服務業;(2)醫療設備之出租或租賃服務業。

- [2] 台灣對中國開放承諾 (1) 跨境提供服務:沒有限制。(2) 境外消費:沒有限制。(3) 商業據點呈現: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台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批發交易、零售交易、經銷服務等;中國對台灣的開放則是(1) 跨境交付:批發服務不作承諾;零售服務除郵購外,不作承諾。(2) 境外消費:沒有限制。(3) 商業存在:a. 對於同一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累計開設店鋪超過 30 家的,如經營商品包括農藥、農膜、化肥、糧食、植物油、食糖、棉花等商品,且上述商品屬於不同品牌,來自不同供應商的台灣服務提供者的出資比例不得超過 65%。b. 對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的出版物分銷企業的最底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大陸企業實行。
- [3] 2014 年 3 月 18 日,為反對立委單方面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宣告存查的學生所發起佔據立法院議場的行動。內政部警政署多次嘗試驅離佔領議場的抗議學生卻都失敗,同時來自台灣各處的學生與群眾也前往立法院支援,發展成為太陽花學運。在數次清場過程警方一共逮捕了 3 名抗議學生以及 1 名示威民眾,此外還有 38 名警員在推擠衝突中受傷(Lin & Culpan, 2014)。
- [4] TVBS 民意調查中心,調查執行日期為 2013 年 6 月 25 日,有效樣本 1,170 位台灣 20 歲以上民眾,抽樣方式為電話號碼後四位數,95% 信心水準,抽樣誤差值為正負 2.9%。
- [5] TVBS 民意調查中心,調查執行日期為 2014 年 3 月 30 日,有效樣本 938 位台灣 20 歲以上民眾,抽樣方式為電話號碼後四位數,95% 信心水準,抽樣誤差值為正負 3.2%。

參考文獻

- 〈台民眾信任度調查：命理師和名嘴墊底〉（2011.06.01）。上網日期：2017年3月11日，取自 <http://city.udn.com/2976/4641159#ixzz49j9WWtNI>。
- 王娟（2013）。〈風險治理中公眾對專家的信任研究綜述〉，《科普研究》，3(8)：35-42。
- 王嵩音（1995）。〈情境公眾之傳播行為與認知策略〉，《民意研究季刊》，193：27-43。
- 朱元鴻（1995）。〈風險知識與風險媒介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195-224。
- 易佳玲（2011）。《政府風險溝通、新聞發布與媒體報導之研究——以新流感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向愷（2013.08.24）。〈林向愷：服務業空洞化 衝擊更大〉，《自由時報》，7版。
- 林思平（2016）。〈新聞文化角力下的本土報紙閱聽人〉，《傳播研究與實踐》，6(2)：173-207。
- 林倖妃、林昭儀（2013.02.05）。〈年金改革 沒解決的3大問題〉，《天下雜誌》。上網日期：2017年3月15日，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208>。
- 林鈺雄（2014.03.22）。〈焦點評論：佔立院是為了救國會〉，《蘋果日報》，3版。
- 林嘉誠（1989）。《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為》。台北：商務出版社。
- 洪雅慧（2009）。〈北、高網路選民大不同？媒介使用、媒介重要性評估與政治犬儒主義、投票行為之關連性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7(2)：1-45。
- 徐仁全（2015.06.01）。〈台灣社會信任度調查 誰相信總統和民代？〉，《30雜誌》，130。上網日期：2017年6月20日，取自 http://www.30.com.tw/article_content_28917.html。
- 殷乃平（2013.07.03）。〈服貿協議 太匆匆〉，《蘋果日報》，11版。

- 郝明義 (2013.06.21)。〈郝明義：沒書刊准印證 暫別簽約〉，《聯合報》，2版。
- 陳憶寧 (2004)。〈媒體議題與公眾議題演化過程之探討：以 2002 年臺北市長選舉為例〉，《新聞學研究》，81：125-162。
- 陳憶寧 (2011)。〈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17：31-60。
- 彭芸 (2004)。〈我國大學生的媒介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對象之關連性研究〉，《新聞學研究》，79：91-133。
- 彭賢恩、張郁敏 (2008)。〈政治置入性新聞對新聞可信度之影響〉，《新聞學研究》，95：55-110。
- 黃懿慧 (1994)。〈科技風險的認知與溝通問題〉，《民意研究季刊》，188：95-129。
- 楊意菁 (2013)。〈網路意見的新聞再現與公眾想像：「網友說」新聞的內容與論述分析〉，《中華傳播學刊》，24：119-164。
- 楊意菁、徐美苓 (2012)。〈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溝通：以全球暖化議題的情境公眾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2：133-168。
-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 (2008)。〈選舉事件與政治信任：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問題與研究》，47(3)：29-50。
- 韓智先 (2001)。〈網路討論區的議題設定效果研究：以中華民國八十九年總統大選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顏秀美 (2003)。《公立高中學生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研究所教學碩士論文。
- 蘇蘅、傅榆 (2011.11)。〈新時代的政治傾向、新聞信任與資訊選擇：從美國牛事件看大學生對爭議性議題的資訊尋求與判斷〉。「2011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台灣，台北。
- 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hared risk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Elaborating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2), 134-140.
- Asim, Z., & Todd, A. M. (2010).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deology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science: How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cross ideological divid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6), 743-761.
- Bakir, V. (2006). Policy agenda setting and risk communication:

- Greenpeace, shell, and issues of trust.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1(3), 67-88.
- Beck, U. (1986/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 Bekkers, V., Beunders, H., Edwards, A., & Moody, R. (2011). New media, micro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agenda setting: Crossover effects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media usage. *Information Society*, 27(4), 209-219.
- Belsley, D. A. (1991). *Conditioning diagnostics: Collinearity and weak data in regress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Bousfield, N. K., Cook, A. N., & Roesch, R. (2014). Evidence-based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for Canad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health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Canadian Psychology*, 55(3), 204-215.
-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
- Breakwell, G. M. (2000). Risk communication: Factors affecting impact.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6(1), 110-120.
- Cairns, G., De Andrade, M., & Macdonald, L. (2013). Reputation, relationships,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 role of trust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A review.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8(12), 1550-1565.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M., & Lee, F. L. (2014). Selective exposure and agenda setting: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artisan media exposure on agenda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301-314.
- Cook, K. S., & Cooper, R. M. (2001).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operation, trust, and social exchange. In E. Ostrom &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pp. 209-24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Dart, J. (2014). New media, professional sport 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38(6), 528-547.
- Dennis, J., & Webster, C. (1975). Children's images of the president and of government in 1962 and 1974.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3, 386-405.

- Forbes, L. P., & Vespoli, E. M. (2013). Do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 consumer buying behavior? An investig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and purchase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11(2), 107-111.
- Giesbrecht, N. (2007). Community-based prevention of alcohol problem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ncreasing deregulation of alcohol. *Substance Use & Misuse*, 42(12/13), 1813-1834.
- Graham, M., & Johnson-Avery, E. (2013).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and social media: An analysis of the perceptions and trends of social media use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level.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7(4), 1-21.
- Griffin, R., & Dunwoody, S. (2000). The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o risk judgment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related to lead in tap water. *Health Communication*, 12, 81-107.
- Gruzd, A., & Roy, J. (2014). Investiga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 A Canadian perspective. *Policy and Internet*, 6(1), 28-45.
- Hänggli, R. (2012). Key factors in frame building: How strategic political actors shape news media coverag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6(3), 300-317.
- Hardin, R. (2001). Gaming trust. In E. Ostrom &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etherington, M. J. (1999).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1968-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2), 791-808.
- Holian, D. B. (2006). Trust the party line: Issue ownership and presidential approval from Reagan to Clint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4(6), 777-802.
-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Dorfman, P. W., & Gupta V. (2004).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Jennings, R. (2014.04.10). Taiwan's sunflower protesters end parliament blockade with fighting wor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June 12, 2016, from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4/0410/Taiwan-s-sunflower-protesters-end-parliament-blockade-with-fighting-words-video>
-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 Ratick, S.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77-187.
- Kim, J. N., Lan, N., & Lee, E.-J. (2008.11). Classifying public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blem-solving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oversial issu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USA.
- Ladd, J. M. (2010). The role of media distrust in Partisan voting. *Political Behavior*, 32(4), 567-585.
- Ladd, J. M. (2011). *Why Americans hate the media and how it matt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ppin, A., & Aro, A. R. (2009). Risk perceptions related to SARS and avian influenza: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6, 7-29.
- Levi, R. (2001). *Medical journalism*. Ames, IW: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ews, R. E., & Tyshenko, M. G. (2009). The impac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and the public reaction to mad cow disease in Canada. *Risk Analysis*, 29(5), 714-728.
- Lichtenberg, J., & MacLean, D. (1991).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Kasperson & P. 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on risks to the public*. Dordrecht, N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in, A. & Culpan, T. (2014.03.19). Taiwan students occupy legislature over China Trade Pact. Bloomberg. Retrieved August, 10, 2016, from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3-19/taiwan-students-occupy-legislature-over-china-trade-pact-vote.html>.
- Lin, C. A. (2009). Selective news exposure, personal values, and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7(1), 18-34.
- Mazur, A. (1984). The journalists and technology: Reporting about love canal and Three Mile Island. *Minerva*, 22(1), 45-66.
- McQuail, D. (1997). *Audience analysis*. Berkeley, CA: SAGE.
- Monberg, J. (1998). Making the public count: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emer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sed publ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8, 426-454.
- Mou, Y., & Lin, C. A. (2014). Communicating food safety via the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knowledge and emo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reven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36(5), 593-616.
- Mutz, D. (2005). Social trust and e-commer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9(3), 393-416.

- Naumov, V. (2014). Social activ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and new media: The case of the tent camp protest action in Minsk, 2006.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87, 291-315.
- Neff, R. A., Chan, I. L., & Smith, K. C. (2009). Yesterday's dinner, tomorrow's weather, today's news? US newspaper coverage of food system contrib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2, 1006-1014.
- O'Brien, S. (2009.01). Political conflict, the media,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USA.
- Ogata J., K., Denham, B. E., & Springston, J. K. (2006). Effects of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dvanc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in health contex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4(1), 94-113.
- Procopio, C. H., & Procopio, S. T. (2007).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Internet communication, geographic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risi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67-87.
- Renn, O. (1991).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R. E. Kasperson & P.-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ng risks to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87-324). Dordrecht, NL: Kluwer Academic Press.
- Rotter, J. B. (1971).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443-450.
- Sill, K. L., Metzgar, E. T., & Rouse, S. M. (2013). Media coverage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How do journalists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court decis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0(1), 58-80.
-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4799), 280-285.
- Stokes, D. E. (1962). Popula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H. Cleveland & H. D. Lasswell (Eds.), *Ethics and bigness: Scientific, academic,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p. 61-72).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Vijaykumar, S., Jin, Y., & Nowak, G.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virality of risk: The Risk Amplification through Media Spread (RAMS) model.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12(3), 653-677.

Williams, A. E. (2012). Trust or bust? Questio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trust and news atten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6(1), 116-131.

Effects of Media Trust, Political Trust,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Inten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en-Cheng Fu^{*}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levels of media trust influenced the risk perception, risk acceptance, and behavior intentions of individuals regarding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media influences people dealing with a significant social risk issue was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a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1,269 samples were collected while the Legislative Yuan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for the Cross-Strait Trade Agre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vesting trust and attention in the media influenced the risk perception, risk acceptance, and behavior intentions of individuals.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the media dependency and political positions of audiences are also key variables.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behavior intentions,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political trust, media trust, risk perception

^{*} Wen-Cheng F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